

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

郑有国 著

简牍对于中国关系，分为关系，分文
漫了生活陈漫了生活的
……简牍画……简牍学
不仅仅是们 不仅仅是简
而且是身，而且是东
化中一个文化中的一个重
……只要柱……只要将
内文化和简的文化和外
的文化来简的文化来比
也就不同，也就不难
的差异，中的差异，并
国用简中国用简的
一个相有一个相承
只有把。只有把这
明，才[揭明，才能
显示其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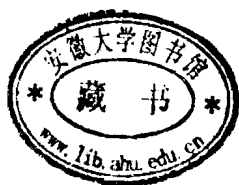
——劳干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郑有国 著

湾简牍研究六十年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郑有国著. —福州: 福建
人民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211-06328-4

I. ①台… II. ①郑… III. ①简 (考古) —研究—台
湾省 IV. ①K877.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474 号

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

TAIWAN JIANDU YANJIU LIUSHINIAN

作 者: 郑有国 著

责任编辑: 史霄鸿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30 毫米×99 毫米 1/16

印 张: 13.50

插 页: 2

字 数: 16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328-4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简牍，在我国古代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用作书写文字的载体。到纸慢慢地替代简牍，成为普遍的写作材料之前，简牍曾经非常广泛而且普遍地使用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百姓、边塞戍卒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中国人的书写习惯、阅读方式乃至我国文人思想、文人习气的养成，与这种独特的写作材料与写作工具，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简牍，就是指经过人工删削过的用来书写的小竹、木片。《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经流行使用简策，但目前尚无实物发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简，牒也”。“牍，书版也”。“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王充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契，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作为书写材料来说，简和牍又是两种不同书写材料的名称。《说文解字》就说：“简，牒也，从竹间声。”段玉裁作注解：“按简，竹为之”。“牍，书版也，从片”。什么叫片呢？《说文解字》说：“断木为片。”简、牍，在最原始的含义上，其区别可能是源于材料的质地不同。

随着时间的流逝，使用的广泛，人们对简牍也有了不同的分类与称呼。

根据简牍内容或者长度来称呼。用作日常书写信件，人们经常称为尺牍。这是因为书写信件，通常用短的一尺长的材料。

书写法律的，比较庄重严肃，一定用三尺长的材料来写，以示尊重。《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孟康注解：“以三尺竹简书写法律也。”以长度命名的，还有人们经常听到的二尺的檄。

根据写作材质的形状不同，也有不同的称呼。四方形的就叫做方。多边形的可以称为觚、苦。颜师古注《急就篇》说：“觚，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汉书·律历志》注引苏林曰：“六觚，六角也。”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第12·1号简，就是一枚四面的觚。

还有的是根据一枚简牍上的容字来称呼的。正常一枚简牍，从上到下一般是写一行字，但有的比较宽，可以容下并排的两行字，因而就写上两行字。这样的简，后人就称之为“两行”。

根据简牍的用途的不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检、揭、符、檠，等等。

简牍的称呼，是一个比较有意思但仍然缺乏深入研究的领域。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从一般使用到严格规范的书写制度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简牍的称呼是随着书写制度的规范而形成的。简牍到魏晋之后，逐渐退出，代之以纸。经过几百年，到了唐代及更后的历史时期，对简牍的辨识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必然出现多种的释义，时常会出现用后代人的理解、注疏来释读前代，这样反而更加混乱。因此我们研究简牍的称呼与形制，应当更多地从其使用的时代、使用的制度形成上去把握。

中国近代的简牍研究，是随着近代科学的考古活动发掘出大批简牍而发展起来的。

已经历百年的中国科学的简牍研究，一方面是对出土简牍进行基础的研究工作，包括：清洗、编号、照相、拼接、复原、制作图版、释读、编制各种索引和公布发掘报告等。另一方面是依

据简牍基础研究的成果，把具体的简牍内容同传世文献记载相结合，阐发简牍内容的意义与价值，并用以证史、补史、纠谬、辑佚和校勘。

但是这种研究，仍然是把简牍作为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的附庸，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简牍本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974年，台湾学者马先醒首先提出“简牍学”概念，把近百年依附于敦煌学的简牍研究，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虽然那个时候，出土简牍还极为有限，但马先生的独到眼光，确实是令人赞叹的。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简牍学，究竟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内容是什么，都有待于深入探讨。有趣的是，关于简牍学概念的争论还在进行之中，20世纪90年代末，大陆学者又提出使用“简帛学”的议题。

究竟用“简牍学”还是用“简帛学”呢？

中国古代作为书写材料的，大约有甲骨、陶器、青铜器、玉石、竹简、木牍、缣帛，最后才是纸。

有的学者从书写材料的质地上，以是否坚硬、耐久来区分书籍与铭文。当然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有纪念性的文字亦常记载于柔软易损的材料，而文章和书籍亦常镌刻于坚硬耐久的物质上，垂之久远。总之，书写材料的采用，主要是由使用的目的以及材料的供应而决定。当然，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是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从书写材料来划分有局限，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来考察，就是从书写工具来看：从甲骨、陶器、青铜器到玉石，都是用尖刀利刃来铭刻，而竹简、木牍、缣帛到纸，都是用的毛笔。

现代意义上的纸，因为其制作成本的关系，只是在两汉才开

^①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始在上流社会使用的，在纸普遍使用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是使用竹、木材料，加工成书写工具，也就是人们所习称的简、牍。毫无疑问，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是有局限的，比如在绘画上，简牍就不能从容地发挥。从出土文物上来看，有些图形就画在宽大的叫方的木牍上。但无论如何，木牍的宽度也是有限的，在特别需要绘画的地方，就要用丝织的缣帛来作写作材料了。

但不管怎样，竹帛、简牍、简帛、竹书、帛书，这些称呼都是就其书写材料来谈的，都是用的中国文化中不可匮乏的毛笔来作为书写工具的。也正是从这点上，可以把简牍、帛书和用刀、铸形成的甲骨文、金文等区别开来。

可能就是从简牍和缣帛都用毛笔书写这一点上，简牍研究大家，高敏先生说：“广义的‘简牍研究’，应当把‘帛书’的内容也包括在内，帛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简牍。”^①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的重点不同时，可以用竹帛研究、简帛研究、简牍研究、帛书研究等，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我想用“简牍学”来概括已经可以反映要研究的对象与本质了。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书名用《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希望讨论的范围包括简、牍、帛书研究，在此作一声明。

高敏先生曾说：“所谓系统、科学的简牍学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简牍学应当是把全部出土简牍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纵向、横向研究，从而揭示我国古代简册制度的渊源、内涵、演变及其有关规律的学问。它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一些方面：简牍的发现史，包括自然发现与科学发掘史；简、牍、方、觚、札、检、揭、遣册等等不同简牍名称和涵义及其区别；简牍的制作材料与制作过程；简牍书写时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及其意义；关

^① 高敏：《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于简牍本身按照书写内容不同的长短宽窄的法律规定及其变化发展；编制简册的各种有关规定与作法；书写简牍时按简牍内容类别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格式及其变化发展；书写简牍的字体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战国简牍与楚简的字体特征与规律值得深究；不同时代的简牍书写时所使用习惯语言的揭示与归纳；整理与研究简牍的基本方法、途径与步骤的总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应当都是系统的科学的简牍学的内涵。通过简牍学的研究，如果能揭示出不同时期的出土简牍在字体特征、书写格式、简牍形制、习惯用语等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与规律来，将会有助于残简、断简及散乱简牍的拼接与复原，也有助于判断无纪年简牍的年代，更可以反过来推进简牍的基础研究与运用研究的水平。”^①

可以说，简牍学就是以简牍这种载体的文字文物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历史、文字、文献学、档案目录、版本等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发现并整理、研究其形式、内容，补证史实，进而探索中国书籍制度形成之原，推而上之，讨论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形成。

最后我想引用简牍研究大家劳干先生的话来对简牍学的意义作一说明。劳先生说：“简牍是在用纸以前，保存记录，发布公文……的主要方式……简牍对于中国文化上的关系，分支极多，弥漫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简牍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简牍的本身，而且是东方社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支柱……只要将中国用简的文化和外国不用简的文化来比较其异同，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并且明了中国用简的文化，有一个相承的传统。只有把这个传统揭明，才能显示其真相。”^②

在此，劳干先生对简牍学的意义，已经讲述得非常明确了。

① 高敏：《简牍研究与简牍学刍议》，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30日。

② 劳干：《简牍学要义·序》，载马先醒著：《简牍学要义》，台北简牍学会印行，1980年。

目 录

第一章 台湾简牍研究的分期	[1]
第二章 劳干与台湾初期的简牍研究	[8]
第一节 劳干与居延汉简（一）	[8]
第二节 劳干与居延汉简（二）	[24]
第三节 劳干与居延汉简（三）	[31]
第四节 台湾简牍研究之初起	[55]
附：颠沛流离的居延汉简	[68]
第三章 1974~1990 年的台湾简牍研究	[77]
第一节 马先醒与简牍学研究（一）	[77]
第二节 马先醒与简牍学研究（二）	[81]
第三节 台湾汉简研读班与《居延汉简新编》	[99]
第四节 汉简研究	[104]
第五节 睡虎地秦简研究班	[112]
第六节 秦简研究	[116]
第七节 吴福助与《睡虎地秦简论考》	[124]
第四章 1991~2009 年的台湾简牍研究	[130]
第一节 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30]

第二节	史语所汉简整理小组	〔134〕
第三节	《居延汉简补编》	〔140〕
第四节	弱水简牍研读会	〔143〕
第五节	台北简牍学会三访旧居延	〔154〕
第六节	其他一些机构和组织的简牍研究	〔161〕
第七节	两岸同步的台湾简牍研究	〔167〕
结语 简牍学的框架构想		〔177〕
附录：台湾简牍读书会释例		〔183〕
释例一：弱水简牍研读会研读报告		〔183〕
释例二：四分溪简牍研读会研读报告		〔196〕
跋		〔206〕

第一章 台湾简牍研究的分期

台湾的简牍研究严格地说是从 1949 年迁移到台湾的大陆学者开创的。在此之前，台湾既没有出土简牍也没有出现过简牍研究学者，更没有简牍研究之说。正因为有了劳干等一大批学者及其携带到台湾的简牍资料，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台湾学者的学术研究日益精进，学术成果不断出新，台湾简牍研究风气也在逐步培育形成。

从 1949 年至今，台湾的简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一，1949 年到 1974 年，为第一时期。
- 二，1974 年到 1991 年，为第二时期。
- 三，1991 年到现在。

1949 年到 1974 年，这是台湾简牍研究的第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从研究群体来说，清一色都是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学者。他们主要是延续在大陆时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居延、敦煌汉简，研究汉代边塞制度及其他一些相关制度。

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培养了台湾年青一代学者对简牍研究的兴趣。

1974 年到 1991 年为第二时期。从研究群体来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领军人物来说，也出现了变化。这一时期，台湾简牍研究的发展主要在于：第一，形成以马先醒为领军的研究队伍，聚集起了一批台湾各高校的年轻学者，传播简牍知识，培

养了一大批台湾简牍研究的新生力量。第二，简牍研究的专门刊物和组织出现。如1974年《简牍学报》创立，1977年成立台北简牍研究会，1980年创立睡虎地秦简研究班等。第三，在此基础上，马先醒开始简牍学科的建立。他撰写了大量的有关简牍制度的文章，如1977年《简牍论集》、1980年的《简牍学要义》，组织《居延汉简新编》的编纂工作，以居延汉简为主要史料，编写独具特色的地方志《汉居延志长编》等。

第二阶段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对已经存有的简牍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但这一时期马先醒在培养台湾简牍研究力量和推动台湾简牍研究与世界接轨的贡献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阶段。以1991年8月台湾简牍学者参加在甘肃兰州举行的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标志，台湾的简牍研究终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台湾可以及时全面地分享大陆出土简牍的资料，展开共同研究，并开始与大陆学者开展全面、平等的交流。这一时期，第一，台湾年轻学者迅速成长起来，并活跃于两岸的学堂。第二，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限于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他们开始了对大陆新出土的秦简、新居延汉简及各地出土汉简的研究。第三，台湾学者开始亲自参与考察西北居延汉简出土地。

在第一个阶段，学术一方面要绝对地消除日本殖民地教育因素影响，“对日本既有的研究成果作了消极的排斥，另一方面对大陆时期的研究成果只作局部的继承，结果在学术研究的传承上，呈现几近断层现象，历史学研究似乎从头做起，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实是非常不幸的一段”^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大陆来台学者的坚持，才尤显得可贵。

^① 高明士主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总序》，2004年。

也正是如此，我在写作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把两岸的学术衔接做了铺垫，并把劳干先生作为一个典型例子，花了较多的笔墨。

我把1974年《简牍学报》刊行，作为一个时间断代，主要是基于当时台湾简牍研究的断层状况提出的。这一点，台湾学界也都已经看到。第一，是政治因素，两岸隔绝，出土简牍又主要在大陆，两岸信息不通，接触大陆，往往如火如灾，不敢接触。第二，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大陆来台的学者不断地离开台湾到各地讲学。第三，台湾经济发展后，能静下心来进行学术研究的青年人不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先醒《简牍学报》的创刊，无疑是打破了这种沉寂。就像台湾学界也认为的一样，“自1974年始，马先醒创《简牍学报》，乃成催生研究简牍风气”^①。对于简牍研究史或者台湾简牍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忘记的年份。

从《简牍学报》到居延汉简研读班、台北简牍研究会、《居延汉简新编》、睡虎地秦简研究班、弱水简牍研读会，正是马先醒的提倡与坚持，正是马先醒的努力与不断进取，台湾简牍研究才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三阶段以1991年台湾学者首次参加在兰州举行的简牍学研讨会作为断代分期，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的。首先，简牍出土在大陆，间接从其他地方获得资料，毕竟是迟滞的，两岸的互通和无障碍的学术交流成为事实，这是关键。其次，台湾史语所的简牍整理小组也是在1987年“戒严令”取消后开始的。在此之前，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也只能躲在冰冷的仓库地上，无人敢问津。再次，“199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化、影印机的普及，历史学研究也随之电脑化……已经完全革新过去的研

^① 高明士主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2004年，第145页。

究技术，堪称为‘电脑工业’革命”^①。史语所引进日本红外线扫描，也使简牍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这种的大环境下，两岸的学术交流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台湾简牍研究与大陆开始同步。

关于台湾简牍研究的分期问题，马先醒在《中国史学》第四卷《台湾近年（1989—1993）简牍研究述略》一文中提到：“1957年劳干先生纂刊《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为配合之，1960年更刊新版《居延汉简·释文之部》，为台湾地区的简牍研究，奠定基础。1974年笔者发起台北简牍学会，梓行会刊《简牍学报》。东、西洋简牍学者大庭修、鲁惟一踵继来访，出席台北简牍学会主办的‘中日简牍座谈会’、‘国际简牍研讨会’，劳干先生曾亲临指导，可谓台湾简牍研究的第二期。继之，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等史研所相继开授‘简牍学’课程，多由笔者承乏。其后诸大学文史科研究生以简牍为论题者渐多，是为第三期。撰写论文及需数据，久寝之居延汉简原物不得不启封面世，且以红外线仪、计算机等重新董理，是为第四期。汇集旧、新居延汉简资料，以成《汉居延志》，当属第五期事。”^②

我觉得马先生的分期有不够完善之处。因为台湾的简牍研究，从文献上查，可以查到1950年《大陆杂志》刊载的简牍研究文章。而且史语所的研究刊物《史语所集刊》，伴随着史语所从大陆迁移台湾，一直都在刊载简牍研究专家们的心得，从无断期。此外，我们认为1949年来台的大陆学者除了对台湾简牍研究的启蒙与推介，对培育台湾的简牍研究力量也是功不可没的。马先生本人也是在劳干先生培育启发下才形成对简牍研究的

① 高明士主编：《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2004年，第145页。

② 马先醒：《台湾近年（1989—1993）简牍研究述略》，载《中国史学》第四卷，1994年10月，第79页。

兴趣的。

马先醒的高足吴昌廉在《居延汉简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简牍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有二：一为释文之论定，二为运用释文史料以考史、释史。二者看似分离，实则互为表里：新版本的刊定往往会影响到考史与释史，而考史与释史亦可刊正释文的讹误。因此回顾居延汉简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居延简牍的发现至图版刊行以前。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为数一万枚以上的简，由于出土地系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总称为居延汉简。这批简册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分别进行校释，后因抗战爆发，最终整理出版以劳氏为主。1936年，劳干与余逊首先合作出版《晒蓝本汉简释文》（简称为“晒蓝本”），共计著录3055简。1943年劳干在物资条件极其缺乏、困难下，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简称“南溪本”、“石印本”），由于该书仅印300部，且未附简影，流传不广。1949年，劳氏又重新整理出版《居延汉简考释》（简称“上海本”、“铅印本”），共含“居延汉简释文”、“敦煌汉简释文”及“居延汉简考释·简号索引”三部分，全书以铅字排印，内容上较南溪本丰富，且书末附“永元器物簿”之简影。此一时期主要以劳干的研究为主，“马先醒先生说可称为‘劳干时代’”。

1957年至1972年为第二个阶段。1957年，劳氏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简称“台北本”），至此一万余枚居延汉简首次公之于世。1960年劳氏又出版《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分释文与考释二部，释文不分类、卷，次序与《图版之部》配合对照。另外在大陆有《居延汉简甲编》。此一时期有劳干、陈梦家、张春树、陈槃等，研究的人数开始增加，所研究的题目之广度与深度有长足的进展。

1973年至1989年为第三个阶段。马先醒接踵劳书之后，创立《简牍学报》，在居延简的著录方面，则先针对所有版本作校对，于1981年出版《居延汉简新编》。在大陆，有《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此一时期以《简牍学报》之刊行最为重要。吴昌廉、邢义田、何双全、陈文豪、李均明、谢桂华等年轻学者崭露头角。

1990年迄今为第四个阶段。1972年至1974年新出居延汉简于1990年刊行。在版本上，1988年先有《居延新简释粹》出版，1990年和1994年，文物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居延新简》，前者仅有释文，后者将图版与释文分上下二册。两种版本互有优劣。汪文儒曾作报告《居延汉简释文整理计画之一隅——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标号200至250间之简牍为例》，即对二种版本进行对刊与比较。^①

吴昌廉教授是从居延汉简的研究角度出发，以重要的出版物来作为划分的时间依据的。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陈文豪教授认为应把台湾简牍研究分为三期：第一期，台湾的简帛学研究，以劳干、陈槃等大陆来台学者为主。1977年台北简牍学会创立，是为第二期开始。以秦简出土以后进入第三期，尤其是大量楚简出土，故文字及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加入，情形和大陆差不多。

不可否认，他们关于台湾简牍研究的分期的认识，对于我是有积极的启发意义的。实际上我正是遵循着他们的分期思想来进行我的探讨的。

不管如何分期，台湾的简牍研究经过六十年的培育与推广，已经深深地渗透进台湾各个大学、研究机构。其影响的领域包括

^① 吴昌廉：《近六十年来居延汉简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6月，第179～190页。

哲学、文学、历史、考古、简牍保护、地理研究等各个方面。

六十年来台湾的简牍研究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各个研究机构、高校的学者都非常关注对年轻学子的培养。有的虽然已经身为著名简牍学专家仍然在开办读书班，不辞劳苦，培养下一代学子对简牍研究的兴趣。这种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二，台湾的先秦研究，无论是历史、哲学、中文，几乎已经没有人不在利用出土简牍的资料了。三，各种简牍研究会、讨论会，已经开始整合相关的资源，进行分工，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